

读书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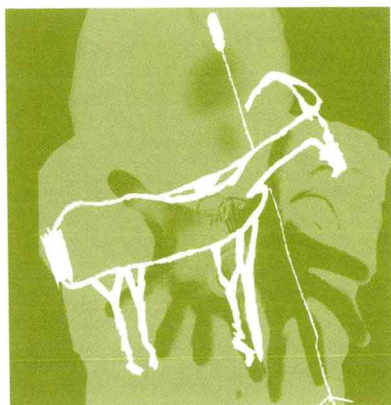


多少次散场
忘记了忧伤

李皖 著

六十年三地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李皖 著

多少次散场
忘记了忧伤

六十年三地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少次散场 忘记了忧伤: 六十年三地歌/李皖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12

ISBN 978-7-108-04211-8

I. ①多… II. ①李… III. ①流行歌曲—中国—文集 IV. ①J6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6424号

启 事

为了使读者对1949~2009六十年间的三地歌曲及歌手有更直观的感受, 本书收取了部分唱片及专辑的封面图片, 因一时间难以一一与图片的设计者及出版机构联系, 所以请相关著作权人与本书责任编辑联系, 当按照规则为使用的图片付酬, 特此通告。

联系方式: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书店 (邮政编码: 100010)

责任编辑 吴 彬

封面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 数 160千字 图片 364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55.00元

目录

序 / 3

六十年三地歌之一：

解放（1949—1956） / 5

六十年三地歌之二：

民歌嘹亮（1957—1966） / 19

六十年三地歌之三：

红太阳（1966—1976） / 49

六十年三地歌之四：

花样年华（1966—1980） / 71

六十年三地歌之五：

解冻之春（1978—1985） / 89

六十年三地歌之六：

西北风，东南风（1986—1989） / 105

六十年三地歌之七：

摇滚中国（1989—2009）/ 125

六十年三地歌之八：

都市忧郁（1989—1994）/ 149

六十年三地歌之九：

偶像的力量（1994—2009）/ 175

六十年三地歌之十：

民谣，民谣（1994—2009）/ 211

附录 / 249

风雅颂和艺术的业余精神

——概论台湾校园民歌 / 250

中国是什么：歌曲中的线索 / 281

后记 / 290

序

作为急吼吼的现代人，我一直遗憾，历史写作远远落后于时代。这辈主要想看到这辈子的历史，得等到下辈子，或下几辈子。显然，人的命没那么长，等到下辈子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这辈子的历史是看不到的。

当然，我们可以从其他途径，读到关于这一辈子——新闻、资讯、日记、文学、纪录片……但这跟历史，究竟不同。历史希望有一个整体的观照；同时是沉淀的，有深度，此种深度与人类整体的深度是同等的，或者说，为人类整体的深度提供新的量度、新的延续；它坚固，不易碎，能给人以豁然开朗、洞若观火、坚固稳定的眼光。

多少出于这原因，我在仓促之中接下这个活计，写一部六十年来中国歌曲简史。我写的这部历史，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从一九四九年起，一直写到我搁笔时的眼下，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公历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日）的这个感慨，道明了中国近两百年来剧烈动荡的现实。这是世界连成一体后，发生在中国这个局部的景观。身在其中，如置身汪洋中的小船，四周狂风骇浪不息，内心无片刻安定。因短短一生的脆弱无常，我们或许夸大了这激变的程度。写下这六十年的歌曲历史，思接远古和

当代，从这一小小局部，我似乎看到了一点内部的景象，那在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云水风雷下面，来历分明、绵绵不息的母体的延续。抚今思昔，遂心有所定，心有所安。

李皖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六十年三地歌之一：解放

1949—1956

一九四九年三月，太平洋另一侧。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头像，头像右侧写着四个汉字：“民主统一”。

大年初三，北平和平解放。三天后，北平百姓在前门看到精神抖擞的解放军，骑在坦克上，坐在卡车上，从家门前驶过。京剧老生马连良的女儿马力，刚刚中学毕业，她发现：队伍里满是和自己同样年轻的面孔，战士们脸上的笑容，不像是出自军人，倒像是来自胡同里的孩子。

南方依然在国民党统治下。四月，进步作家徐迟在一列火车上，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诗兴大发，写下一首被他自己称为“一生所写最美的政治抒情诗”——《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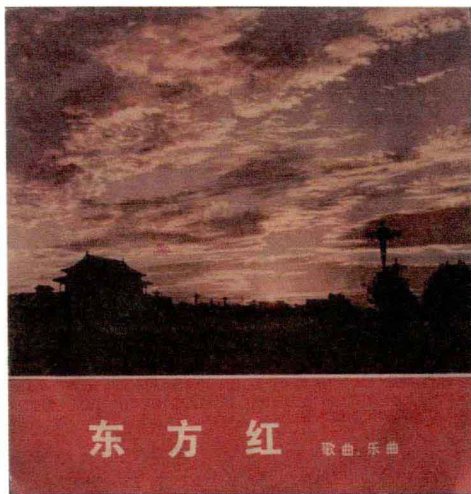
火车窗是最好的镜框。
如果里面是江南春雨，
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画框。

……

透过最好的画框，
江南旋转着身子，
让我们从她的后影，
看到她的前身。

徐迟说：我看到同车的人群，恨的是我不能大声地告诉他们：同胞们，再过三天之后，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前来解放我，解放你们了啊！

从一九四九年到五十年代的前五年，中国人民被一种解放的情绪所感染、所占据。有一首凄楚的晋西北小调，最早叫《芝麻油》，北方的民间艺人一直这样唱：“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在五十年代，它的曲调没变，但歌词变成了：



《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现在，《东方红》词作者一栏上仍写着：李有源。这是个历史的误会。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叔侄，虽然对这首歌有贡献，但它的新词作者却另有其人，准确地说，是一大帮子人，有延安小学音乐教员李锦旗，有延安文艺工作者刘炽、公木、王大化、高阳、田方、严文井。它不是哪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在群众性的传唱中，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词、我一个词凑成的、改成的、传唱成的。

一首晋西北的酸曲，在十余年的革命历程中，不断改编、传唱，并随着革命的胜利，变成了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的领袖颂歌。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作家徐迟在收音机前听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这样的场景在他从南得来到北京后，屡屡撞见。

徐迟没有跟人们一起欢呼，他还从来没喊过万岁，喊不出口，觉得别扭。

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万岁”的初步理解》。文章写道:

过去的少数人呼皇帝“万岁”，是被强迫地下跪低头勉强去呼喊，现在则是人民被解放，很自由愉快地跳跃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以表示自己领袖衷心的尊敬和热爱。

“万岁”并不含有任何封建意味，而为人民自己的语言！

“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时候的毛泽东，主要的还不是个人英雄，而是一个集体领袖，是一个新兴国家的象征。

但历史的发展遍布了曲折迂回的秘道和暗结。已经有研究者发现，第一批喊“毛主席万岁”的浪潮，始自延安中共“七大”期间（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是时，毛泽东通过“整风”和改组中央，使自己成为党的唯一、绝对的核心——这是中共党史的转折点。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宣部起草“五一”节口号，在最后两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之后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如果说“毛主席万岁！”以前确是“群众”自发喊出的口号，那么现在，它成了中央领袖和中央政府作为中央文件发布的口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王莘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王莘流出了眼泪。

一九五〇年九月，王莘第二次来到天安门。此时，广场上正在准备迎接建国一周年：城楼上，工人们在试挂大红灯笼；广场上，有几支工人和学生



《歌唱祖国》

队伍在练习走队，准备在国庆那天接受检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飘扬……看到这些景象，王莘脑中浮想联翩。

天安门广场上的灵感，逐渐形成了《歌唱祖国》词曲。原稿经过诗人艾青之手时，艾青改动了几处，将“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歌唱祖国》历久不衰，直至五十七年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被张艺谋的导演团队起用，再一次地向着全世界唱响。所不同的是，当年雄赳赳的大合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童稚的独唱；当年的进行曲，速度被放慢了差不多一倍，变成了抒情歌谣。革命的雄壮淡下去，爱国的情感和悠远时光的追忆提升上来。光阴变幻，星移斗转，同样的歌词，让人生出不同的感怀。“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当这样的歌词重新响起，祖国这列列车已经从出发点开到与当年完全不同的所在，这个时候，你在想什么？

随着解放军南下、西进的步履，解放军军歌从南刮到北、从东刮向西，传遍了整个国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词，郑律成曲）；“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歌唱二郎山》



山石上的《歌唱二郎山》

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岳仑曲）……

一九五一年夏天，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来到二郎山，慰问进藏修路部队。男高音歌唱演员孙蘩白，想起他非常喜欢的时乐濛创作的《盼望红军快回家》，他想给这支歌曲填上解放军修建青藏公路的新词。创作员洛水很快把词拿出来了，叫做《歌唱二郎山》。配着时乐濛的曲，孙蘩白只觉得词与曲结合十分妥帖。他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登台，一唱便成功，台下掌声经久不息。孙蘩白一连唱了三遍，才勉强能够谢幕。但仍有战士感到不过瘾，站起来高喊：“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慰问团继续西进，继续为二郎山修路部队演出。当慰问团返回时，这首歌已插上了翅膀，传遍全国。如今，在四川二郎山，山石上刻下了《歌唱二郎山》词曲，成了旅游景点。

军歌，体现了一种新的歌曲美学，它来自解放区，追溯起来，至少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了。这不是中国民歌原本的血统，粗略捋一捋，它的祖宗是学堂乐歌，来自二十世纪初的西式学堂；更远来自西欧各国和日本歌曲，在清末新军训练中改编；在适应中国水土和现实的过程中，又重新汇入中国血

液。经由沈心工、李叔同、黄自、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歌曲大家，这种新传统一路铺洒开来。中国近代的西化开明风，到二三十年代的激进革命风，到三四十年代文艺政治功能化的急风，歌曲历史中，实存在一条隐伏而强劲的脉络。

到延安“鲁艺”时期，“革命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歌曲美学已经在思想教化、政权统治的沐浴中生根、坐大，成为解放区的新型美学，彻底颠覆了原来流行在大城市的旧上海流行音乐。新的歌曲美学是合唱的艺术，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往往，它用进行曲式表现革命队伍的一往无前，用雄壮昂扬的旋律表现革命人的高昂斗志，用整齐洪亮的合唱表现革命队伍的团结一心。

大众文艺是怎样变成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一个最通行的方式是，将民间流行了上百年的老调子换上时新的革命化的歌词，更改变它的节奏，将原本消极的调子变得明亮，由此形成健康、明朗、境界开阔、充满希望憧憬的新调。

这样的创作非常普遍，仅举一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于一九五二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结业时的作品，歌曲中有一句歌词：“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

歌词中“我的家乡”，指科尔沁草原，一九二八年美丽其格就出生在这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在科尔沁草原发起寻找民间艺人的活动，找到四位极具代表性的老艺人，其中有一位是美丽其格找到的，就是马头琴大师色拉西。跟着色拉西老师，美丽其格学会了拉马头琴。

一九五一年夏，美丽其格把自己关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里，闭目端坐，一遍又一遍地拉马头琴。他想要在琴声和心声的交融中寻找灵感，写一首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品。此时，草原上骏马奔驰的种种美好景象一起涌上心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曲调和歌词几乎同时喷涌而出，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这样诞生了。

这首歌刚一唱出即如浩浩长风吹入人们心田，它的抒情，词曲所表现出的大草原的美，令人向往。这首歌不仅感动了许多人，它的创作对美丽其格本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因此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又到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这首歌被翻译成俄语，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世界上有不少人，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草原，认识了蒙古。

一九五〇年夏，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武力干涉朝鲜内战，出兵越过了“三八线”，战火迅速向中朝边境蔓延。毛泽东认为，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美帝国主义的行为，危及了全球的共产主义解放运动。十月二十五日，一百三十余万中国志愿军唱着战歌陆续奔赴朝鲜战场。《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开头的几句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一场跨国的大战，它怀抱的希望，它背负的民众激情，广而告之，公开到世人面前，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国家梦。

美国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扬言，要在两



郭兰英

个星期内结束朝鲜战争，回美国过圣诞节。他万万没想到，后来美国为这场战争竟熬了三年，并先后动用了它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

与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相抗衡，让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上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郭兰英，这个旧社会戏班子里唱旧戏的女子，以当时无人能出其右的嘹亮嗓音，唱出了中国人当时的豪情。

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县一个贫苦家庭，六岁开始学唱梆子，七岁在戏园初次登台，十一岁随戏班到太原市演出。出唱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让她成为新中国首屈一指的歌唱明星。

当《我的祖国》大合唱形式的副歌响起，田园风的抒情画面，一跃变成勇壮的英雄群像，对祖国的深情怀恋，升华为提起祖国就禁不住感到骄傲、激动、热泪奔流的炽热情感，甚至，为保卫她而流血牺牲也是壮美的。当时的人就有这股子劲儿。

歌曲出现在电影《上甘岭》中。有一位艺术界的前辈对曲作者刘炽说：“我听出来了，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优美深情的女儿，又找到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刘炽回答：“是的，你很理解我的苦心，我把《我的祖国》当成柔美明媚的女儿，把《英雄颂》（电影《上甘岭》主题曲；乔羽词，刘炽曲）

作为威武不屈的儿子，他俩各有风貌、性格，但共同点都是民族的，而不是俄罗斯的、法国的和德意志的，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的！”

新生的共和国，内地的巨变，原《小说月报》主编包天笑只能从报纸中得知一二。他从上海移居台湾。和他一样，一批批国军官兵及其家属陆续迁来此地，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宣布转移台湾。三天后，蒋介石从成都撤离，来到这个隔着海峡与大陆相望的岛屿。

祖籍苏州的包天笑，开始怀念家乡的美食：在江南春夏之交，上海会有一种新蚕豆上市。在台湾菜场，他从来没买到过这种豆子。农家告诉他，台湾土壤不适宜种这种豆。包天笑在日记中写道：“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

临年年底，他从别人那里要来五六十粒豆种种下，并写下一首打油诗：

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当内地人民高唱着《东方红》、《我的祖国》，欢呼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到来时，香港、台湾的各阶层人士，此时的心情却在“思家”，他们耳际萦绕的，依然是过去那个国家流行的歌曲，是“旧上海”的歌曲，这是他们熟悉的文化生活，也是故乡的乡音。被解放区音乐所中断的中国都市流行音乐，却在台湾和香港得以延续。

“好花不常开 / 好景不常在 / 愁堆解笑眉 / 泪洒相思带 / 今宵离别后 / 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黄嘉谟词，刘雪庵曲）。这样的一首四十年代的上海流行曲，继续在这一时期的港台流行，感时怀人的词曲，此时更有一种亡国的凄清，思国的情怀，如同南唐李煜的心境。